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進度報告

都市形式與經驗之歷史變遷：台北之案例 (I)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orm and Urban Experience: The Case of Taipei (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 - 2415 - H - 002 - 059

執行期間： 89年 08月 01日至 90年 10月 31日

計畫主持人：夏鑄九教授

計畫研究群：博士生 林秀姿

碩士生 遲恆昌、廖建彰、林毓瓊、

麻生沅、陳宜伶、鍾佳沁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中華民國 90年 10月 25日

一、理論角度

閱讀都市的形式與建築類型，若能結合都市經驗的歷史轉化角度來解讀，當能掌握不同的社會意義。

暫時借用列斐伏爾 - 索亞(Lefebvre-Soja)提出的三元空間分析架構，來說明台北的特殊性建構：「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徵的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不同概念，以區分不同層面的空間特殊性，雖然仍然有些曖昧之處，但對空間經驗與歷史之分析，卻相當有啟發性效果。列斐伏爾提出感知的(perceived)、構想的(conceived)、生活的(lived)三重空間經驗之展示，結合實質物理層面、心理精神層面與社會層面，強化三元空間分析架構。

首先，空間實踐，包含了生產與再生產，以及做為每個社會形構特徵的特殊區位和空間組合，這一支影響及我們在先前所提的政治經濟學取向。其次，空間的表徵，緊緊於生產關係所安置的秩序，關係著知識、符號、符碼等關係，它透過知識而展現，即透過理解與意識形態而展現，藉由一種建構的方式介入，是種構想概念式的空間做為專業的“規範”(canons)，它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理性與專業結構的根基(Lefebvre, 1991:38)。最後，相對於前述空間實踐與空間的表徵所具備的空間的社會化規範性權力關係，表徵的空間，是生活空間的核心，關係著反身性的(reflexive)向度(Shields, 1999:64)。它具備複雜的象徵論，有時有編碼，有時沒有編碼，是透過相關的意象與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居民與使用者的空間，是藝術家等所描繪的空間，是被支配且消極經驗的空間，然而可用想像力來試圖改變與佔有它。它與實質空間重疊，將客體做象徵性使用。所以表現的空間多少傾向於是非語言的象徵與符號，沒有一致性的系統(Lefebvre, 1991:39)。列斐伏爾試圖連結三個面向之間辯證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案即是試圖以列斐伏爾的三面向間的互動關係為基礎，就台北市個案不同時間與空間的研究，歸納出幾點初步研究成果，我們把它用四個部分加以結合，以期表現台北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之歷史轉化過程中的創造性混亂(creative chaos)的特性。這種創造性混亂的經驗是一種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強制性力量(imperative)，它翻轉了台灣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這也就是迫使我們必須面對它、質疑它與挑戰它的“現代性”(modernity)力量。

本研究案目前採取一個開放性架構，將尊重研究者(研究生)的興趣與專長，而有各個領域或的子題加入，並將新子題的加入而隨時進行理論架構的調整，而非封閉性的理論應用研究。

- 一、殖民與後殖民的空間實踐
- 二、專業論述、政府實踐與空間表徵
- 三、文學再現出的表徵空間
- 四、全球化網絡與流動空間

二、研究子題與切入點

一、殖民與後殖民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

關於真實空間實踐的部份，本研究案將以兩個個案來窺探從殖民到後殖民的空間實踐，一是在日據時期成為殖民者所募力汲汲經營的「西門町」，到了戰後也成為台北市的都市中心，直至東區的興起後，它又成為一向為社會制度所不容的青少年所佔領的區域，卻也成為日本最新流行的引入地，這種歷史的循環與轉風，確是回答都市形式與都市經濟轉化最好的個案。二是戰後台灣的店屋如何於 1960-1970 年代左右轉化為透天厝（販厝），甚至窺透天厝在戰後至公商式建築類型成形時，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台灣都市形式中重要的支配性建築類型，店屋這種由清代主要商品經濟與漢人移墾社會中，在城市通商口岸或可巷城市經營出的建築遺產，在歷經日本殖民與戰後，究竟是經歷了什麼樣社會經濟、制度與社會關係的改變，而顯現為新的透天厝建築類型，確實也是回答台灣都市形式空間實踐的最好案例。西門町是一個特殊的小區域，而店屋/透天厝雖是建築物，不過卻也是台灣當時普同經濟所具體化的建物類型，由特例到普同性，其實這兩個個案對於說明殖民時期到後殖民的空間地景的轉變，確實可以說明些東西。

二、專業論述的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相輔並透過西門町與店屋/透天厝（販厝）在台北空間的實踐，這部份則將再討論空間的表徵，即空間如何被視為表徵成為書寫空間的方式，都市計畫與建築設計就是一種關於在空間上書寫表徵的制度，它其實是可以分為政府部份所推行的制度，以及專業者在其中所扮演與推行的論述。於是我們更藉由專業論述的分析向度，來解讀台北空間個案的表徵書寫：以 1970 年代以來的「現代中國建築」論述的建構，來解讀專業在空間的表徵建構過程中，所欲建立的論述及其社會意涵。

三、文學再現出的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

即使我們清楚也看到了現實空間與建築類型的轉變，看到了專業論述與政府制度所試圖在現實空間上書寫的表徵，然而大多數的人卻是既生活在現實環境中，又生活在自我建構的想像之中，這兩者其實是無去一刀兩斷的。於是如何理解另一個空間向度——表徵的空間，也是本研究所欲著力的。

整體而言台北市的都市性質在 1970 年代有了大轉變，它由一個生產性資本城市，由一個西門町中心的城市，在 1970 年代由於東區的規劃，也慢慢導出一個漸成為台北市新中心的東區。這種都市性質的轉變，讓台北市形成了新中產階級，同時關聯的都市經濟也為之改變，於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的城市再現也有了大逆轉，本研究跟隨著藉由 1980 年代倡導都市文學的林耀德對於都市文學界定的幾個向度來理解，它包括：城隍關係、城市空間、城市時間、社群關係。藉著小說的再現來解讀小說家既生活於其中又添加了想像的台北，也藉此來比較這些表徵空間所欲表徵的空間與城市觀，究竟與前面二者的空間觀有何差異？彼此如何交

接？此子題確實可以彌補了空間研究在此向度的缺憾。

四、全球化網絡與空間

前面我們看了幾個空間的不同面向時，這些空間基本上都是立基於實質空間上的實踐與表徵，然而我們也漸發現全球化的網絡，早在 1970 年代開始就已經進入了台北的東區，尤其是在 1990 年代的末期，都市的開式與經營不再僅僅限於在地的都市空間，與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網絡關連，已經愈來愈顯現於台北的空間裡，西門町的哈日青少年消費文化即是一個實例。接著，本研究便再納入了兩個研究子題：一是以世界知名品牌的化妝品象徵經濟為例，探討台北作為一個消費城市，全球化的主流象徵經濟是如何的展現在消費網絡與消費空間的連結之上。另一子題則是以台北非主流的青少年額頭丸文化與販賣搖 pub 為例，試圖探討全球化下 pub 與“額頭文化”的網絡，探討一個全球化下的消費空間，如何為非主流價值觀的在地青少年文化所轉化。

三、預期研究成果初擬 歷史轉化

（一）結構性意義賦予與對抗：

所謂前殖民城市之主要性格正在於漢人對今天台灣所稱的原住民進行商品經濟的剝削、軍政的壓迫與漢文化的支配。這就是說，其實仍是文化研究論述中某種硬硬界定較複雜始的內部殖民。然而無論如何，清代中期，活潑的社會流轉終於產生三條南北縱列成線的漢人城市之都市模式，甚至，逐漸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之組合，這就是：港口城市、地域性政治中心與山麓地帶做為農業開發據點之山產集散地（侯台弘，1989:30-31；Wheeler and Pannell, 1973:21）。這個建構過程一點也不是平和的，只是鄉愁式論述視而不見其間的無種突罷了。在此同時，台灣的經濟即使逐步開始納入了國際分工，區域空間與或上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提法，清代的台灣仍不易形成全島性的大城市。

這些地域與其政治中心，仍以福建省城為依歸，這種都市模式其實是典型漢民族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中之“城”與“市”分離模式之台灣版本。到了清末，台灣開港貿易的景緻終於造成了台灣經濟重心北移，也推動了台北建城與置省會的力量（夏鑄九，1988:278-279）。雞籠到新竹的鐵路建設一方面固然表現了以劉銘傳為代表的“自強新政”對寮府技術的開放與接納，它更表現出以鐵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之空間組織萌芽。最後，1887 年（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則是政治上開始將台灣做為一個整體單位對待。（夏鑄九，2001）

（二）殖民現代化的城市

台灣在殖民依賴關係所塑造的都市化過程裡，移植（transplanted）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城市。台灣也經由這個日本殖民的移植過程，真正形成了全島的整體性性格。

台灣的殖民城市是按照空間分工角色上的不同而重新編組，如淡水被改造與轉換為日人高級官員與皇族的休閒地，這是區隔階級的遊憩場所；而台北則是做為殖民地的首都，軍事政治控制

的中樞，殖民地金融資本管理中心，以及全台之消費中心而存在（夏鑄九，1994）。

此時，市區改正及改造台北城周邊區域，規畫了數十條主要幹道、十餘座大型公園以及住宅、學校、機場用地等，成為後來台北市都市發展的主要架構，包括自成系統的綠色軸線與公園規中心圓環與坊坊狀街道，還有古亭、東門一帶寬敞幽靜的日式住宅區等。殖民主義讓台人與日人隔離住居，初日人多居於城內，台人則分布於台北城西邊的大稻埕及大稻埕，日人逐漸向新興區擴張。日據初期，殖民者在台北城內的象徵空間上大規模刮去重寫，把清代封建皇權象徵空間的取向徹底拆解，將天后宮拆除，重新改寫了清代台北府城之「王城」的南北向被刮去重拼，翻轉為一個東向日出之地的新權力軸線（徐裕建，1993），這正是在都市象徵支配層次上，殖民者對舊城的「刮去重寫」（palimpsest），空間被重新重拼（respell），使得新殖民者塗銷（erasure）了舊標記的「落後」污點（夏鑄九：2000：13）。

西門町則是台北殖民城市最重要的消費場所。1904年台灣總督府決定配合第三次市區計畫事業的道路計畫，拆毀清代所建的台北府城城垣，改築三線道路，並設有步行道，到處配有圓形或半圓形小公園，夜間時分是殖民城市少數有夜生活場所。殖民者藉著想像帝國首都的鬧區淺草，來改造西門町，並以淺草的熱鬧市景類比西門町橢圓公園與夜市和電影院。三線道除了象徵殖民統治的威權，亦是日本歐化風格的建築與空間實驗改造的一部份，百年後的現在，三線道重現，並越過東京直探原野模仿巴黎香榭大道。（遲恒昌，2001）

西門町的形成立證了城市商業中心的轉移，漸取代前現代時期的大稻埕，成為台北這個殖民政治中心的新興商業中心，商業活動不僅更緊密地整合到日本殖民經濟結構裏，並和帝國首都東京淺草的歷史發展對軌，這正是殖民的現代性建構。（遲恒昌，2001）

（三）國族重構與冷戰結構下的城市

沿襲日本殖民城市制度的殖民城市與中華文化連繫期。各項經濟資源為國民黨政府接收，並轉化為國家資本，城市中的街道也被重新命名而賦予一套政治意味的街名系統。除此之外，城市的規畫與建設計畫內容其實都還保留殖民時期特徵。國民政府撤退台灣，而使台北成為單一的都市，唯有防空疏散目的的建設持續著，同時各種歐化風格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築形式，漸在台北官方建築出現，而都市規畫論為沿襲殖民時期計畫和戒嚴城市的措施，加上以農養工的農業外銷導向經濟政策，台北市人口激增，但都市空間與都市規畫卻未能有效擴張。（曾旭正，1994）

這時的台北地景有很強的政治意味：都市空間有很強烈的區域差異（省籍、窮富、住/商行政區分明）具政治象徵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築成為支配性地點。（曾旭正，1994）

戰後中華路鐵道旁的低下階層與外省族群的遷徙聚落，以及後來興築的中華商場與西門町的百貨公司建構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要城市的中心商業區。整個中華商場被串連成一棟立體化的購物商場，隔著中華路與西門町電影院連成一氣（呂芳斌，1984），成為戰後做為第三世界首要城市台北重要的街景。西門町除了百貨公司，電影院提供了一種異質異國的文化刺激，西門町一度聚集達37家電影院之多，除了國片新電影，更是此時美國電影文化的中介地，在戒嚴年代西門町始終提供了舶來的消費娛樂。（遲恒昌，2001）

國族重構下的中國官式建築，在專業上確實也產生了一套相關的論述（表徵），彼此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爭論。一支屬「本位文化派」建築論述，反對全盤西化，亟欲重回「傳統」尋求（中華）民族認同，堅持對易中國建築特色。另一支則屬「新派」建築論，主張「新時代應追求新的建築」，批判「復古」，而主張由「精神上」、「原則上」傳承中國建築，使用現代建築風格附會中國建築精神，或以簡化、抽象化或元素拼湊的手法納入傳統形式語彙。基本上，它受國際建築運動逐漸拋棄實質性的影響，新派藉由地或主義的論述找到了參與中國建築現代化大業的正當性。圓山大飯店（1973）、中正紀念堂（1987）、國父紀念館（1972）都是此時期的代表作。（廖建彰，2001）

（四）經濟發展下的都市形式與都市經驗變遷

在現代政治經濟政策的主導下，在政府精心策略的介入影響，推重部門勞動力的移轉，「雙重動員策略」下，（Chen,1981:225），「以農養工」政策下的城鄉移民大量集中於台北地區，而尤消費、交換、金融、指揮功能也集中於台北市及台北都會區，呈現鉅型集聚首要化（primacy）的特性。（孫義崇，1988）1967年改制後的台北，民間資金與人口的集中卻實質擴展了都市空間，但政府政策反而錯過了都市快速發展的階段，致無法有效引導都市發展，反而在後追趕著民間的發展。民間在動盪情況下，發展出一套特定的資金運作機制，即房屋銷售制，小規模開發商便成為都市空間的主要生產者，販賣便是在這種歷史脈絡下興建出一棟棟密集的小公寓，形塑了台北大多數的地景。由於銷售制是依賴消費者提供資金，只適用於規模不大、產權清楚的住宅與小型辦公室，而商場建築及大型辦公室幾全由財團投資，但這直到1980年代才密集出現，尤其是出現在台北東區。（曾旭正，1994）

1980年代之後，台北西門商業中心的沒落而東區崛起為「新」的中心，但後者並不是以相同功能區位來取代前者，而是在台北切入世界經濟文化網絡過程中，以一種新的空間形式、活動類型乃至新的國際關係的優勢，取代了前者，因為當世界經濟漸被跨國性的組織網絡組合起來，大幅度地避開了國家和國際規範的架構，而整個生產方式也加以重組，從一個階級主義時代邁向後階級的單性積累時代，此即為台北東區能成為企業總部中心而被整合的過程。就社會文化方面，可以說此時產生了一種新階級，它是新國際分工的中心/邊陲國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中介的代理人，一種與台北疏離，但又是台北的新地景與服務業的主要消費者。東區的成為新時代的國際金融櫥窗。

這時期是台北景觀變遷最劇烈的時期。

從1960年代以來拆擴棚廠改建為嶄新大樓的（西門町）中華商場，一直到1970年代還是台北的重要地標，也是城鄉移民入台北市的入口。隨處可見的新建公寓是1970年代重要的都市地景元素，線條簡單、現代主義造型的公寓陸續取代舊有的日式宿舍或二層連棟住宅，公寓生活成為一種全新的都市經濟類型，是種疏離、更加分化的社會空間。明顯地影響了社區意識、城市認同生成的可能性。（曾旭正，1994）

然而，這種現代化的地景，到了1980年代以後，伴隨著新國際分工發展，資本也轉向服務業及地產投機，資本密集的建設公司出現，配合跨國的商場管理支持，而「信義計畫區」是全台

灣第一個實施都市計畫管制的地區，台北的商業空間才明顯地改變。於是辦公大樓、百貨公司漸成為東區的新興地景，東區不僅成為台北的新都市中心，這種新都市性質更成為新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中心。

本研究有好幾個子題是針對此種轉型的：

一是對於 1960 年代以來傳統店屋轉為(販厝)透天厝個案的命題：針對 1965 年以後到 1970 年代興盛的透天式販厝作土地分割使用、營造過程、類型學的社會意涵等探討，是本透天厝興建的家族個案研究的切入點，期待可以由新竹的個案研究，看到一些社會制度與社會關係的轉變，如何體現在新建建築類型的萌芽上，以及一個在殖民前的分散移民社會所形成的商住合用的店屋建築，再歷經日本殖民及戰後台灣社會的變動，從殖民前到後殖民，一個店屋建築如何轉化為透天厝，以及形式與經濟關係的如何重組，都是此店屋/透天厝個案欲回答的問題（陳宜伶，2000）

二是針對戰後以來的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論題，在進入消費社會的轉向：台灣做為臺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最快速成長的時期，快速都市化造成城鄉空間結構的劇變與文化解組；一般傳統學院教育下的建築專業者已無力掌握現實。此時論述的焦點有：透過對某種歷史文化中典型概念直觀對部的溝通方式。於是，採用現代建築的建材與結構語言，配合東方傳統色彩的裝飾語彙、細節的拼貼或拼貼，形塑成一種異質地方的效果，達到商業包裝宣傳的效果。有的反對折衷形式，於是主張以民間自發的「過程」取代折衷的規範，考慮傳統風格在現代社會的適應性，將焦點轉移到了建築生產的程序。（廖建彰，2001）

三是針對這種都市性質與經濟的轉型，人們對於這種都市轉型與經濟的體察與再現：1970 年代以來到 1990 年代，台北市東區新中心的形成，不僅台北由一個生產性資本城市，開始轉向成為重要的企業總部所在地，也成為地產與消費資本的城市，藉著買房與中產消費生活方式的形成，每個人都成為重要的經濟環節，透過對於買房與消費的“自主性”想像，仰望著另一種東區中心的城市生活形態。

都市性質在此時有了轉變，人們的都市經驗也有了改變，對於城市的想像與夢想的期待也有了轉變。1950-60 年代以農工時造成的城鄉移民，是在經濟政策下不得不到城市求生，城市代表的是工作機會的多寡，即使當城鄉移民開始於 1960-70 年代於台北市購屋，想望的是將台北市當成第二故鄉（曾旭正，1994），意即在「心理上」仍然是把農村生活與社會關係轉移到城市，認同的仍是由原鄉的眼光所看到的世界與城市，只是單純的以一個「生產者」的身份來定居於台北這個產業城市。然而，隨著 1970 年代台北東區的規劃，東區從松山機噐廠敦化南路，成為台北市的象徵性門戶，加上房地產漸漸往東區發展，以及東區在 1980 年代漸成為高級的社區所在地，新的中產階級生活在東區慢慢散開來。此外，還有大量的房地產廣告所塑造出來的形象，如：1980 年代開始訴求新豪宅、鎖定中產階級，電梯大樓、小套房等高級住宅，在 1990 年代初便成為主要的推案主角，而關於建設公司、建築大師、建物外貌、建材、公共設施、外國意象等符號，便成為販賣的手法，而這種廣告也經常是現實社會關係的再現。如性別分工、家庭關係等（廖世璋，1992）。以及，隨著各種社會力在 1980 年代的慢慢解放，各種階級、性別、族群、社群、社區由臺灣慢慢地在台北找到發聲的機會（柏蘭芝，1993；孫瑞穗，1996；陳惠雯，1997），也將自我轉化為反城市（台北市）主流價值的異質空間（張喬婷，1999；謝淑娟，1999），雖然

台北市史依然是個對女性充滿敵意的城市（陳台伶，1992）。

不僅政府部門所透露出的台北意象有了變化，人們對於這種城市意象的想像也有了改變，是種仰望一種「新生活」的想像，不管是仰望政府、地產、產業部門所塑造的新中產經濟、生活、文化形式，或是人們自己想要脫離故鄉既有社會規範，仰望一種城市裡自由主體生活的可能性，就因為有了東區的台北，才讓台北已不可動搖了，才受人們的仰望，台北城已不再是城鄉移民的第二故鄉而已！直至1990年代，當發現這種仰望夢碎了。

1970-1980年代的台北，是個充滿「現代化希望」的台北，從建築型式由低層轉為現代化技術的高層，從勞力密集轉向中產階級生活，從傳統中國建築轉向與現代消費結合的現代中國建築，從農村看台北轉為在台北看世界的中產階級，是個在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過程中，台北東區與世界經濟連結的一個時期，是國民黨政策藉現代化經營來建構政治正當性的時期，但是台北基本上是台灣各地「仰望」的中心，在台灣各地同步進入現代化之際，只因台北東區是連結中心國經濟與文化的樞紐。不過，也在此成為台灣各界目光關注之際，台北也有各種受到不友善對待的經驗與發聲，西門町成為青少年聚首之地，是在此時，各種社會運動的蓬勃，也是在此時。

（五）全球化象徵經濟流動與消費之城

柯亨特（M. Castells）認為流動空間是資訊社會支配性的空間形式，「流動空間」包含了三個層次：一是由電子交換的回路構成；二是由節點與核心構成；三是佔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流動空間的概念打破了以往對於產業活動在地理上被嚴格劃分的邊界，藉由新的資訊技術以全球為活動場域，資金在全球流動研煉熱錢，並以全球為依歸選擇商品製造過程中管理、製造、生產到配銷的位置，形成各區域因其歷史結構性的位置而形成「新國際分工」，尤其是在1990年代電腦網路成為重要的溝通工具時，這種跨國界的資金、生產、行銷、理念等的流動更是快速。

伴隨著全球化城市的競爭壓力所進行城市空間與功能的調節過程，最後造成了階級矛盾的浮現，空間的區隔性亦增強，而新都會中產階級文化卻主導著台北的城市文化。自台北於1980年代進入新的國際分工時，長期以來歷史因素所造成的集體消費不足、非正式經濟所衍生的非正式地景，也漸因國家正當性來源的轉變（因所得提高而要求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邁向國際化），非正式地景漸為建制化地景所取代，市民社會內部的矛盾在族群及階級的參數下，清楚的浮現，而台北市地方政府對於康樂里（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違建的產除，背後的驅動力正是中收入階級護衛家園生活品質和房地產的綠色意識形態。這種新的城市／社會公共意識型態，其實是將「它者」化為不道德的中產或自己的代罪羔羊，以正當化執政者、中產階級或主流階級的各種對生活環境品質的需求，對於不符中產階級想像的地景與公共性，則以此為正當化手段加以剷除。（吳欣隆（1998）、謝淑娟（1998））這可說是台灣都市「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建構，而此時的台北，隨著各種全球與地方聲音的出現，隨著政府政策與資本的更加緊密結合，讓進入全球象徵文化經濟脈絡的台北，更顯現出如夏鑄九所提的概念——「創造性混亂」（creative chaos）般景象，它包含了各式文化象徵經濟在台北的移植，地方的改造，以及各種關於再生的轉化，以及資本的逐漸引導政策的轉化。

1970年代經濟再結構下，西門町走向城市非主流文化——青少年的集中地，而一個新的台

北在正形成。在台北新東區浮現的過程中，西門町的行人徒步區欲重振西門商業功能，板南捷運線貫通新舊台北，在 1990 年代拉近了東區與西門町。同時，全球化的流行青少年娛樂工業活動高度匯聚於此，加上公部門的更新計畫，讓西門町再度躍成台北西區再發展的標竿。西門町由殖民者的歡樂街發展而來，今日仍是日本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聖地，東京的流行文化的重鎮步谷 原宿成為台北西門町青少年與店家慾望的他者。中介流行文化的西門町其實正邁向日本化與全球化，西門町呈顯的是後殖民的文化與經濟再殖民，還是可以更戲謔地說是彩色書寫文化雜文的後殖民地景。（遲恒昌，2001）

台北不僅有再度成為日本全球象徵經濟欲望下的青少年西門町，早自 1980 年代以來，東區已是各歐美跨國公司的重要據點，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大型的合資百貨公司（SOGO、新光三越、Idee、大葉高島屋）進駐台灣，打敗了本土的遠東、力霸、欣欣大眾百貨，而成為台灣人消費時尚的新寵；麥當勞、先施、小雅，到大眾消費導向的星巴克（Starbucks）與華納威秀電影院，及各種跨國品牌服飾鞋包的紛紛進駐東區，我們生活漸漸由許多的跨國公司的象徵文化消費活動所籠罩，漸從本土傳統消費習慣，轉型到全球性跨國企業進駐後產生的國際消費習慣。在這過程中，跨國企業所塑造出一致的品類形象，運用著整體的符號概念加以全球複製，空體設計也成為產品包裝的重要一環，甚至將空體符號化以動感複製之用。於是本研究主題便試圖以雅絲蘭黛這個跨國的化妝品百貨專櫃個案，試圖探討跨國公司如何在地方做設計，一個一致化的全球複製建築設計尺度，如何放給地方設計師設計，全球化的流行產業如何面對地方的不同消費取向與文化傳統。（麻生沅，2001）

權效的臺灣跨國百貨化妝品專櫃消費經濟的「正式」地景，本研究再度提出另一種相對的「非正式」象徵文化經濟的地景，即搖頭丸 pub 的形。搖頭丸在馬來西亞、香港、還有台灣形成一波青少年 pub 文化下的附加消費產品，「搖頭丸」不僅是毒品的一個新代名詞，更是青少年另類的新階級符號與消費符號代碼，隨之而成的電子音樂（英國的 Rave party）搖頭音樂之名因而興起。然而，搖頭丸最早在中南部的舞場興起，兩年前才在台北發跡，幫派固定堂口在大安區的及中山區的農家 pub，原本單純經營業者，也因此做起中盤商，賺取暴利，搖頭店因而產生。台北這種由美國移植過來的 pub 休閒領域，於是本研究主題更是藉搖頭店的探討，瞭解台北都會中產的休閒 pub，如何成為挑戰主流休閒價值的 pub，包括搖頭丸、電子音樂等如何形塑出這個挑戰了台北市中產主流價值的空間，以及全球流體的文化如何被移植到台北，中間如何為台北的搖頭店所轉化。（鍾佳心，2001）

在這個全球化流體的象徵文化經濟的 1990 年代，快速的流體與消費快感的都市經驗，讓人變得碎片，於是才有像搖頭丸 pub 這樣的非正式地景的產生。同樣的，這樣的都市經驗，才改變了人們看待城市的眼光。都市小說除了有快速與流動經驗的描述外，台北人的情欲與物欲解放，也成為新一代小說家重要的主題，相較於此，也有另一支開始尋找歷史記憶與城市記憶的追尋，西區及 1980 年代以前（現代化之前）成為認同的地點，同時鄉村也消失了，郊區（尤其是作為台北市的休閒地 淡水）與台灣東部都被浪漫化了。

1990 年代與全球商品、政治、網路的快速連結，都讓都市小說以快速的經濟

時間為主軸，以及生活於其中要求解放望的青少年、或幫派等「非主流」價值觀的時間，不過這都是都市資本邏輯的時間觀。相對於此的是，延續著對於西區與 1980 年代以前的認同，消失的空間之時間，如眷村、西區、歷史記憶，以及各社群不同生活方式的時間，城鄉移民、小攤販、妓女等很底層的時間，也才在這時候紛紛出籠。

四、進度說明

研究的各個子題進度不一，不過，第一期已有兩篇碩士論文件隨研究案完成，分別是：

1. 遲恆昌，2001，《從殖民城市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論。
2. 廖建彰，2001，《建築神話——戰後台灣「現代中國建築」論述的形構（1940 年代中 - 1990 年代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論。

其它研究子題的進度：預計 2001 年底再完成兩個研究子題，2002 年 7 月再完成兩個研究子題，中間或再有研究生願意以新的研究子題加入研究案，則再進行調整進度。